

---

# 让事实说话

## ——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章开沅

---

关于南京大屠杀,最早在国内外同时出版的原始史料结集,应是《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在这些目睹日军暴行的外国人之中,有一位就是当年奉命留守校产的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Dr Miner Searle Bates, 1897\_ 1978)。贝德士生前保存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救济委员会档案文献甚多,堪称实录南京大屠杀的“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现均妥善保存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s)。本文仅就与田伯烈有关之若干问题略作论述。

### 一 一位态度极为公正的外侨

《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史料价值甚高,当时为保护资料提供者的人身安全而一律隐其姓名,但却为读者带来某些理解方面的困惑,甚至为那些“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者留下若干可乘之隙,因此有必要对此书进行认真考订。

譬如,田伯烈把此书第一章第一部分资料的提供者,称为“这是南京一位最受尊敬最有声望,态度极为公正的外侨”。此人是谁?

---

H. J. Timperley,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London, New York: Modern Age Books, Inc., 1938)。同年7月,杨明译的中文本《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在汉口出版。此外还出版两种日文译本,一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为《何为战争? 日军暴行录》。

田伯烈和他在国际委员会中的友人当然心中有数,可是外界人士,特别是后世读者却摸不着头脑,其实此人即贝德士,因为田伯烈其后又引用了他的另一封信,并且介绍说:“提供本书第一章第一部材料的某君,又于1月10日,即在日军占领南京将近一个月后,写信给他的朋友们。”这封信的原稿,我已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中发现,信尾清清楚楚署有“(signed)M iner Searle Bates”的字样。

这封信当时复印并秘密送往外间者似乎不少。因为,早在1938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已在日记中提及贝德士此项活动。其1月10日日记称:“金陵大学美国教授Bates,曾在首都目击去年12月13日日军入城后抢劫私家物品,大批枪杀解除武装之我方军士及难民,并搜挟少年妇女于一处而强奸。该教授曾将目击情形,以书面分送中外人士,但未署名。”这里说的似乎是12月15日贝德士给上海友人的信,此信已被田伯烈书收入,而在《贝德士文献》中却未留存原稿。但王氏2月14日的日记即已提到贝氏1月10日的信:“今日由汉口渡江赴武昌,去华中大学之餐约。席间该校代理校长黄涛,具述留在南京之美国教授Bates,最近托美国军舰带出之信息。据B.氏1月10日函称,日军入南京后,其强奸、抢掠与残杀无武器人民之惨状,有非外间所能梦想者。全南京城内,日军强奸妇女之案件,德国人估计在二万件以上,即仅就金陵大学校舍而言,难民之逃避该校中者,约三万余人,强奸案当在8000起以上。有11岁幼女与53岁老妇,亦未能幸免者。至于城内房屋及商店,殆无一家未被抢劫者;劫后往往以化学药物纵火焚烧。此种强奸行为,往往于白昼行之,并往往是由军官领导为之!业经放弃武器与军服之华兵,以及一般难民,被日军任意枪杀者,触目皆是。外国人之留在南京者,亦多受侮辱与劫掠,各国使馆俱被

劫掠。(B. 氏函件已由该校给一份)。”

贝德士是Dr Bates 的正式中文名字。他在1897年5月28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纽瓦克(Newark)。父亲是一位学者型的新教牧师,长期担任本地哈莱姆学院(Hiram Collge)院长。贝德士1916年毕业于这个学院,并获得罗兹(Rhodes)奖学金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历史,由于欧战期间曾服兵役,1920年才获得硕士学位。同年7月,经由基督教联合布道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授予传教士资格并派往中国,从此在南京金陵大学政治、历史等系任教,直到1950年才最终离华返美。1937年8月以后,日军进攻上海、南京,金陵大学西迁四川成都,贝德士奉陈裕光校长之任命留在南京守护校产,并经董事会决议给以应变委员会主席与副校长名义。南京沦陷前后,他与金大社会学系史迈士教授,以及校外外籍人士费吴生、马约翰等,共同创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后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做了大量救济难民与对外揭露日军暴行的艰巨工作。国际委员会的档案文献大部分归贝德士保存并于1950年带回美国,遂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永远的重要罪证。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保存的《贝德士文献》,总共131盒(Box)、1162卷(Folder),数量甚大,内容亦极丰富,可惜至今仍未充分利用。与南京大屠杀直接有关的资料,集中保存于第4盒之第52、59、63、67卷,第102盒之第861—871卷,第126盒之第1137卷。第52卷收有贝德士1938年给友人与妻子的一些信件;第59卷收有1937—1938年国际委员会及贝德士本人与日本大使馆之间的来往信函和附件,还有1938年与上海日本总领事馆之间的来往信函及附件;第63卷收有1937—1938年贝德士与金陵大

---

《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年,)第一册,第163、178—179页。1990年秋,吴相湘先生曾经由“对日索赔会”同事章铨兄函告:“由此可知,当时中国政府是由Bates信件上始知南京大屠杀事,故贝德士文件,见得有副本,其重要性可知矣。”

学创建者会(Board of Founders)之间的信函,1938年与上海全国基督教会之间的信函,以及1941年国际委员会的相关信函;第65卷收有贝德士与田伯烈之间的来往函件;第861—871卷主要是贝德士收藏的各种有关南京沦陷后情况的文献资料,其中863—869卷价值较高;第1137卷是贝德士认为对自己有纪念意义的杂件,其中有他在1946年7月出席远东国军事法庭作证的记录副本,还有若干对此次审判的报道。

只要稍加检阅相关资料便不难发现,贝德士不仅是《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一书资料提供者,而且还是此书编辑工作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他在1938年4月12日从上海寄出的致友人函说得很清楚:“这里正积极准备在英国和美国出版H.J. 田伯烈先生写的一本书,作者是《曼彻斯特卫报》有经验的记者,书名可能是《日军在华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田伯烈先生是一位品格高尚的新闻工作者,他与北平的基督教领导人长期保持密切关系。他保存着得自此间救济团体的陈述中国战争实况的大量文献。这些资料是以公正而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公布的……尽管不能对这项工作承担法律责任,但从一开始我便与它联成一体,曾经参与商讨计划及其发展,也曾校阅全部文稿。此外,该书还利用了我在12月15日起草的一份报告,那是为当时留在南京的许多新闻记者准备的。附件包括许多12月间我给日本使馆的信件。其中也有我在1月10日叙述过去几周南京陷于普遍恐怖情况的信。给日本使馆的信我虽未署名,但南京和上海(即或不包括东京)的日本官员心里都很清楚,这些文件出自我的手笔。史迈士博士由于曾在国际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的各种报告和案件上签名,多少也受牵累……因此,日本当局将有可能特别憎恶南京这个小小的外国博士团体,尤其是我。费吴生由于其日记被引用,马约翰先生由于他的几张照片被刊载,都将严重受牵累。”信中还特别强调:“我们感到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只有我们或与我们一道工作

的人们才能做到如此。”“我们不相信孱弱有所改善我们在世界上所面对的一切。让我们去履行我们自己认定的责任。以善良的心去做并且同样承担其后果。”

信中提到的史迈士(Lewis S. C. Smythe)是金大社会学教授,国际委员会的秘书,曾主持南京地区战争损失调查,编写出版《南京战祸写真》(*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一书。费吴生(George A. Fitch)出生於苏州,基督教青年会领导人,时任南京安全区主任,他的日记是南京大屠杀最详实的记录之一。马吉或马约翰(John Magee)是长期在华传教的美国圣公会牧师,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他曾用小型摄影机拍摄了许多日军残杀暴行的现场画面,成为留存至今的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

## 二 揭露暴行乃是一种道德义务

正是基於上述认识,贝德士、费吴生、威尔逊(Robert O. Wilson, 鼓楼医院外科医生)等国际委会成员,在极其艰难繁忙的情况下坚持逐日逐事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烧、杀、淫、掠乃至大肆贩毒的残暴罪行。

由于田伯烈的书已经发布一部分国际委员会的文献,为避免过多重复,这里只重新译述王世杰所见过且为当时影响较大的1938年1月10日贝德士致友人函。全文如下:

这是在强奸、刺刀捅戮和肆无忌惮的抢劫之间仓促写下的简短笔记,准备经由自日军进入南京局势变化以来所能利用的第一艘外国船只——一艘救援“帕内伊”号的美国海军拖船——将它送出去。上海的朋友们将从总领事那里得到这些笔记,并将设法把它从一艘不受检查的外国船只上送走。

新年以来,拥挤的安全区内的形势已经缓和多了,这主要是由于大批主力部队的撤离。“恢复纪律”时有时无,连宪兵也强奸、劫掠与玩忽职守。由于人事变动和行动摇摆,时局随时可以出现新的变化。这里没有可以看出得出来的政策,外国外交官终于(在本星期)被允许重新进城,这似乎表明一种需要稳定的愿望。

一万多手无寸铁的民众被残酷地杀害。大多数我所信赖的朋友认为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被杀害的是一些放下武器或被俘投降士兵,还包括许多妇女儿童和普通民众,也被肆无忌惮地枪杀和刺死,就连他们是士兵这一藉口也不需要了。能干的德国同事(指国际委员会主席拉比等人——引者)估计强奸案例有20000起。我想不会少于8000起,也许还要更多。仅在金陵大学校园范围内——包括我们一些教职员宿舍和现有美国人居住的房子——我得知详细情况的就有100多例,可以确信的大约有300例。人们很难想像这种痛苦与恐怖。小至11岁和老到53岁的妇女横遭奸污。在神学院里面,17个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个妇女。事实上约有1/3此类案件发生在白天。

城里差不多每一幢房屋,包括美、英、德等国使馆或大使官邸,还有比重甚大的外侨财产,都遭日本士兵反复抢劫。各种车辆食物、衣服、被褥、钱币、钟表,一些地毯和绘画,各种贵重物品,都是猎取的主要目标。抢劫仍在继续进行,特别是在安全区以外的地方除了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和一个军事商店外,南京别无其他店铺。大多数商店起先是人人都可以闯入行窃,继而被一批一批日本兵带着卡车,往往是在军官指挥下,有计划地洗劫一空,然后再行焚毁。我们现在仍可看到几处起火。许多住宅区也被蓄意焚毁。我们取得日本兵纵火用的化学剂片的几个样品,并已调查了这过程的各个方面。

难民大都被抢走钱财,连微薄的衣物、被褥和食品,也至少遭到部分抢劫。这种行为极其残酷,结果在第一周或开头十天,人人脸上都露出绝望神色。这个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前景是可想而知的:商店和机器完蛋了,至今还没有银行和通信系统,几条重要街区被焚毁,其余的一切都遭劫掠,现在人们面临着饥寒交迫。这里大约有250000人;差不多全待在安全区,足足有100000人完全依靠国际委员会提供食宿。其他的人则靠剩下的一点米粮勉强度日。日本供

应部门出于金融和政治上的原因,正开始发放少量从中国大量储备物资中没收的大米,但士兵烧毁不少此类物资。更料想不到的是,当我向日本官员问及邮电服务时,他们回答:“没有计划。”这似乎就是所有经济方面和大部分政治方面的现状。

国际委员会的援助是富有成效的,其活动堪称奇迹。三个德国人干得很出色。为了与他们保持同事关系,我几乎愿意佩戴纳粹徽章。一个丹麦人和三个英国人在初始阶段提供了大量帮助,但在中国人从南京撤退以前,就被他们的公司和政府撤回了。这样,大部分工作就落在美国传教士身上,不过他们全都在挤满刀伤、枪伤人员的病院紧张救护,无暇顾及他。自然,我们有些人承担了各种职务,也有职责观念。从一开始就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帮忙与合作,而大部分琐事不得不由中国人或通过中国人去做,但有时如果没有一个在紧要时刻能勇敢面对枪口的外国人在场,便什么事也办不成,哪怕是运一大车大米。我们冒过若干巨大风险,受过多次沉重打击(既有实在的也有比喻的),但还是侥幸取得远远超过目前局势所能允许的许多成绩。对发生的每件事,我们都注视,都过问。我们承担提供食宿、进行谈判、递交抗议和采取保护措施等一般工作,此外还阻止了许多抢劫,劝阻和吓退了许多小群士兵的强奸和蓄意强奸。难怪一个日本使馆官员对我们说,将军们对他们不得不在中立的观察员(Neutral observers)的注视下完成其占领而感到愤怒,他们声称(纯然出於无知)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情况。

有时候我们完全失败了,但成功的百分比也很大,足以证明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是应该的。我们必须承认,虽然某些方面的关系还远不尽如人意,但由于日本大使馆为缓和日本军方和外国利益之间的冲突作出了努力,领事馆警察(数量甚少,并非尽皆善良)比较合乎礼仪,加上这项事业的主要人物一直是发起“反对共产主义第三国际协定”的德国人,和本国船只遭到野蛮袭击需要抚慰的美国人,我们获益匪浅。由於大量财产案件和国旗问题,日本人两度拒绝我

---

这是诙谐的说法,其实贝德士一直反对军国主义与极权统治,提倡宗教自由。国际委员会主席拉比是南京国社党小组组长,贝德士称赞的只是他对难民救济工作的无私奉献,以及共同揭露和抗议日军暴行,而不涉及政治背景。

们转达美国官员返回的温和要求。虽然本周情况有所改善,我们与乡村和江边还是隔绝的,只有美国海军通过美国使馆进行范围有限的通信联系。

大约从 12 月 1 日起就没有邮件了,以前的邮件也大都曾在途中耽搁。昨夜我们室内的电灯是特别给安排的(我们有 7 个美国人,其中有人与电厂员工有私人关系)。日本人枪杀了电厂 54 名技术员中的 43 个,诬指他们是中国政府的雇员,还有飞机轰炸,大炮轰击和枪弹射击,公共设施恢复之缓慢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缺乏保障是主要的绊脚石。自来水得靠电泵抽取,不过在城市低洼的地方开始有涓涓细流。至于电话与公共汽车,即或是人力车,也都别作梦了。我们安全区的面积大约是两平方英里,还没有完全形成。在这个集中区内,我们没有发现过值得重视的火灾。除了日本兵的犯罪和暴行以外,基本没有其他犯罪和暴行。直到本星期,日本兵又转向安全区外门户洞开的房屋大肆劫掠——特别是抢夺燃料。(没有武装警察)

有 30000 多难民居住在金大校舍各处。管理问题很令人担心,哪怕是维持很低的生活水准。我们当中金大的正式教职员和工人寥寥无几,但他们的工作大多非常出色。志愿帮忙的人很多,由国际委员会把他们很快的聚集一起,他们前来动机相当不纯。现在我要谈到告密以及日本人恫吓和收买特务的问题。我本人就曾遇到三个以上此类麻烦,我开始怀疑他们是否想使我或金大陷入绝境。例如,过去三天中发生两件事,使我对金大附中遭受损失的报告自相矛盾(于是指称我撒谎和欺骗日本人,对我表现轻蔑,从而攻击我和这个庞大难民营的另一个负责人)。另一件事是,一位人格高尚的翻译,不屈服于对他的威胁,拒绝离开附中难民营去为他们工作,被他们像绑赴刑场一样抓走。我试图打听他的情况,结果被别人猛地推进可怕的宪兵办公处的大门。恰好那个办公处的宪兵昨夜从金大一所房子抓走一批妇女并残暴奸污。他们从事此项罪行时,用刺刀对准我们一叫 R 的人,他不该碰巧在那个时候去那个地方。当奋力为

---

R 是李格斯(Riggs, Charles H.),金陵大学美籍职员,国际委员会委员,工作异常勤奋而又勇敢。



那些可怜而又特能忍耐与令人好感的人们做点什么时，你就能领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滋味了。

南京真正的宪兵只有 17 位，而同时则有 50000 士兵放纵无羁，一连几天我们看不到一个宪兵。终于发给一些士兵专用臂章以权充宪兵，这意味着他们为非作歹而可得到保护，不至于被当作普通人看待。我们看到有些士兵强奸时被军官发现并责骂，然后又毫无约束地被放走了。还有人抢劫后只向军官行个礼便可了事。有次他们夜间开摩托车来金大抢劫，实际上就是军官亲自指挥的。他们把我们的门卫逼靠墙壁，强奸了三个妇女，还将其中一个带走（另一个是 12 岁女孩）。

L 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在“帕内伊”号上死了或负伤，因为我仍在南京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那里，而东京的各种报纸则暗示所有外国人都被带上此船。经历 48 小时的悲痛以后，她在一份报纸上看到，日本人进入南京之后不久，两个笨汉（Dumb-bells）打听到我的下落。为回应她的朋友们的感谢，这家报纸于 17 日匆忙派遣几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日本人 13 号进城，“帕内伊”号沉没，慢慢传出爆炸声）。元旦那天，他们有人给我带来一张照片和一封信，日本使馆恪尽职守，当然已经读过此信，这样我俩就免得长时间相互担心。虽然她曾通过各种途径和媒介给我写过许多信，拍过许多电报，但自从 11 月 8 日以来，除了这封信，别的什么我也没有收到。12 月 17 号，她打算在元月的第一周到上海，此外我再没有获知其他消息，也许通过新来的炮舰最近拍发的一份无线电报，可以得到若干来自上海的消息。

可是他们（指日本军方——引者）不让我出南京城，而即使交通工具对她是开放的，她也不会获准出上海西行。我们不知道这种状况将继续多久。中国人非常害怕这些美国人或所有外国人被赶出南京，他们迄今为止害怕我们离开甚于留下。同时，我设法与大使馆工作人员，一些半官方日本人，甚至一些不那么残暴奸诈的警察和士

---

L 是 Lilliath 的简写，即贝德士夫人，金女大教授。1937 年夏与贝德士携二子赴日访问。抗战爆发后，贝德士奉学校之命只身返宁保护校产，夫人与两个孩子此时仍滞留在日本。

兵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很难进行。到今天已有四周了。只要我们事先知悉,炮击与轰炸几乎不再使我们不安。前途未卜!

附言:写这封信不是为了激发对日本人民的仇恨,这一点几乎无需说明。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一个用欺骗的宣传掩盖其罪行的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在我看来,重要之处在于这一战争带来无限苦难。这种苦难因放纵和愚蠢而倍增,使未来长久限于黑暗。

这封信可以看作是,日军进城将近一个月期间,贝德士目睹各残暴罪行的概略综述,而其根据则是国际委员会逐日逐事的记录。

除类似上述私人信件外,《贝德士文献》保存的有关南京大屠杀资料,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1)各难民营综合的或零散的报告;(2)经国际委员会核对、整理,以秘书处名义,向日本当局正式提交的报告;(3)按照国际委员会主席拉比的建议,贝德士以金陵大学应变委员会主席(The Chairman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名义,就金陵大学校园范围内所发生的各项罪行,单独向日本当局提交的正式报告。

国际委员会提交的历次报告(大多由秘书史迈士签发),包括400余案例(编号至444,但间有重复),已被《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作为附录刊布,同时又经徐淑希编为《南京安全区文件》(*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 Shanghai, British Kelly and Walsh Firm*, 1938)出版,所以本文无须重复引述。各难民营零散报告,由于所有罪行事实已经列入国际委员会历次报告,所以也不必一一罗列。这里仅举贝德士以金大应变委员会主席名义,于1937年12月18日,即日军占领南京的第六天,给日本使馆的一封信作为示例。此信正文如下:

由于士兵们的暴虐与抢劫,到处仍然是悲惨与恐怖。超过17000人,多数是妇女与儿童,现在住在我们的校园,渴望安全保障。

他们继续大批涌进,因为别处情况比这里更为恶劣。不过我们必须将此间过去 24 小时“相对良好”的处境记录送交你们。

(1) 乾河沿金大附中。一个恐怖至极的儿童被刺刀戳死,另一个重伤垂死。8 个妇女被强奸。我们几位同事,试图为这些可怜人送点食物并给予照料,却被士兵们无缘无故殴打。士兵不分昼夜,多次爬过围墙。三天来,许多人无法睡眠,出现一种歇斯底里的恐惧。如果这种恐惧与失望导致士兵强暴妇女的抗拒,将要造成毁灭性的屠杀,而你们的当局将为此承担责任。美国国旗被无故撕毁。

(2) 胡家菜园 11 号农具店有两个妇女被强奸。

(3) 润银巷养蚕室两妇女被强奸。

(4) 汉口路 11 号住有我们两个美国同事的教员宿舍,一个妇女被强奸。

(5) 农经系(小桃源)多次惨遭蹂躏,妇女全部逃走。今天早上我到此查看,6 个士兵向我逼近,其中一人不断扣住扳机以手枪对我,而我无非是客气地问他是否在这里发现任何问题。

上述确凿事实,还不包括普通老百姓的悲惨境遇,浪荡成群士兵往往一天 10 次、一夜 6 次向他们索取妇女和抢劫钱财。他们强烈要求立即加强约束。

获悉贵馆代表宣称,昨夜在这些房屋门口安排有宪兵(在其他难民聚集较多地点亦然),但看不到任何一个警卫。由于士兵到处爬墙,少数警卫亦无济于事,除非是整体纪律恢复良好。秋山支队司令部设立于何应钦公馆,给周围造成特殊灾难,可能要等到你们的士兵被约束为止。如果将军有此意愿,司令部本来可成为安全的象征。

此间和全城民众由于饥饿而绝望,因为士兵抢走他们的食品和钱财;另外有许多人挨冻生病,因为士兵拿走他们的衣服和被褥。日本当局如何处理此事? 每条街道都有带泪的悲伤传说,哪里有日军,哪里的人和房屋就无安全可言。当然这并非日本政治家

---

何应钦上将的公馆建于金陵大学校园之内,这幢高级西式建筑至今保存良好,作为南京大学外事接待之用。

所愿如此,所有南京居民都渴望日本人有所改进。

我深信,如果你们之中有一位得便,与我一道前往某些恐怖与痛苦尚在继续的地区,这将比你们老是待在屋里好一些(由于应付七个士兵的例行公事,他们称之为“检查”,实际上是寻找可以在晚上抓走的妇女,因此这封信的书写曾受到干扰)。

昨晚我睡在这里,并将继续如此,期望多少能给无助的妇女和儿童以若干支援。其他从事人道工作的外国人和我自己都受到你们士兵的恐吓,而其反映则是明确的。

此信纯属善意且符合礼仪,但所反映的某些引起不愉快而令人失望的事实,则是我们自日军进城五天以来的亲身经历,亟待解救之道。

另外在《贝德士文献》中还保存着一份他在1937年12月26日起草的《金陵大学登记后果随记》初稿,揭露日军借“难民登记”名义,骗走大批无辜良民并加以杀害的卑鄙罪行。内称:“将近下午5点钟,这两三百人被宪兵分两批带走。第二天早上,有一个身带5处刺刀伤口的人来到金大医院,此人一再明确自认是曾住在图书馆大楼的一个难民,但是他没有到网球场集合。他在街上被抓住,加入确实是从网球场带走的群众之中。那天傍晚(不知是在牯卢寺(音译)以西还是其附近),大约有130个日本兵用刺刀捅死了500个类似的俘虏中的大多数。这个受害者恢复知觉发现日本人已走了,就在夜间设法爬回来。”这次屠杀,如果与草鞋峡、汉中门、汉西门、中华门、花神庙、燕子矶等地成千上万人的集体屠杀相比较,规模虽然较小;但由于二三百受害者是大多从金大校园,而且就在贝德士眼前被诱骗走,所以他既谴责日军“完全不顾信义”,自己内心也充满痛苦的愧疚。他在上述《随记》初稿中写道:“每天有几千难民送来登记,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对在这幕悲剧中处于各种重要地位的日本军官和士兵,必须笑脸相迎,谦恭有礼,接连许多天,

---

Bates' Papers, RG10, B102, F865,

Bates' Papers, R G10, B102, F865.

简直是一种酷刑。我们觉得,我们已成为杀死那二百多人的从犯,应该向他们可怜的家人负责,如果那些人也在附近苦海中的话。”

除了为自己的力不从心,眼睁睁地看着日军每天开进难民营残害中国民众而悲愤自责外,贝德士对美国政府纵容乃至支持日本侵华战争也极为不满。他在1938年11月29日给友人的一封长信中写道:“南京城内美国和平主义者生活的严峻特色之一,是连续几天亲眼看见成百架轰炸机群飞过的经验,有些载着美国装备,而且几乎全部灌满美国汽油。江面上连绵不绝的军舰是用美国汽油驱动的,公路上数以百计的军用卡车也是通用公司和其他美国厂家制造的。加以知悉他在美国的和平主义同伴正在谴责(美国),为了害怕得罪法西斯国家,断然反对通过国际合作走向世界政府蹒跚的第一步,反对取消与侵略者的经济伙伴关系,从而使世界上的弱国横遭蹂躏。难道善意对于他人还有什么胜于强权的实质意义?富国应该为大家的公益作经济调节,而不应以武装的贪婪掠夺他们弱勢的邻居。”

但是,贝德士丝毫没有放弃难民救济工作,也丝毫没有动摇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念。在上述同一封信的结尾,他似乎是向全世界宣告:“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Peace on earth, good will to men)。但是,我们前面的和平能成为慈悲的和平吗?每个灵性的观念似乎都无可抗拒地被置于严峻的形势下接受考验,但我知道它不会错位与扭曲。不要被邪恶征服(Be not Overcome of evil),这是直入心扉的召唤。以善胜恶(Overcome evil with good),需要比大多数人所能见到的更强有力的‘善’,但这无疑是工作的正确途径。所以我们这个圣诞将如此去做。按常识判断几乎没有多大希望,但有大量的爱,即使在毫无希望的粗暴和令人沮丧的地方也

---

Bates' Papers, R G10, B102, F865.  
Bates' Papers, R G10, B4, F52.

可发现。”

他还曾对友人倾诉心曲：“我同其他人一样明白整个局势的严峻与黑暗，在这里很难找到公理与正义。个人自身问题早就有了回答。基督教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用不着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只会为自己难以满足巨大的需求而感到愧疚。”他和国际委员会的同事，继续日日夜夜救死扶伤，为数万乃至十万以上的难民谋求食物与住处，经常以怨求、辩论乃至自己的躯体，在枪口、刺刀与受害者之间从事紧急救援。尽管他们的努力屡遭挫折，但是并不感到孤立无援与沮丧失望。正如贝德士所言：“本地这个为救济难民而奋斗的罗曼史，实在值得付出生命、鲜血、入狱与眼泪；这个德国纳粹（指国际委员会主席拉比——引者）、英国生意人和我们美国传教士合作的故事，已经超越了我们国家的本份；在我们群体内还有一部分是回教徒、佛教徒与天主教徒；应紧急召集而来的许多中国职员显示的优秀素质；面对武器和表现为不断要求‘解散’并命令中国人不与我们合作的不信任所取得的实际成就；所有这些都需要你们现在的服务扩大空间与增强技巧。”

### 三 首要工作是真诚地面对现实

贝德士除为田伯烈提供大量资料，协助出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外，还不断通过秘密通信及向外界新闻媒介提供稿件等多种方式，揭露日军烧、杀、淫、掠，大量贩毒乃至残害慰安妇等暴虐罪行。所有这些手稿与其他第一手文献、图片资料，均保存于《贝德士文献》。

由于环境的隔绝，消息的封锁和日伪的歪曲宣传，当时并非所

---

Mauds Taylor Savis, 《Bates of Nanking》(YMCA, 1942), p. 5.

Bates' Papers, R G10, B4, F52. 所谓解散，是指日本军方极端不满意国际委员会的继续存在与活动，多次要求并设法迫使它自行解散。命令中国民众不得与国际委员会合作，也是其破坏手段之一。

有外界人士都能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实程度。正如贝德士当年所曾指出：“南京罪恶的灾难终于真相大白，虽然很少人了解他的全部意义。田伯烈的书《日军在华暴行》是一本很直率的作品。不幸的是有些人在现今世界的邪恶面前畏缩了，不愿相信他们所谓的‘凶险故事’(A atrocity stories)。为了和平与进步事业，首要工作是真诚地面对现实。”

因此，当一个美国牧师J. C. 麦金由于不明真相且受日伪宣传影响，贸然致函《纽约时报》直指南京大屠杀为“虚构”时，贝德士立即于1938年4月2日给麦金写了一封信，开门见山地指出：“我注意到你曾致《时报》说，有关日军屠杀的故事是虚构的。可能这些时你已经知道它们只能是太千真万确了。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这些事情，我也不能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现代社会，这使人想起古代的亚述暴行(A ssyrian Rape)。我们未曾料到如此恐怖，当这些事情开始的时候，对我们是可怕的震撼。”

为了让麦金了解事实真相，并希望他自己更正言论失误，贝德士这封信再次陈述了自己亲身了解的日军各种暴行事例：

中国慈善团体曾从事大部分掩埋工作，其负责人告诉我，从1月23日到3月19日，已掩埋尸体32104人，他们估计尚待掩埋的数字与此相近。其他一些团体也在从事掩埋工作，还有一些尸体是由亲友自行掩埋。例如，城门以外约1英里处我们教会公墓的守墓人告诉我，在城外被杀的三千至三千平民，是由当地老百姓自行掩埋的。（我需要说明，就在几周前，他自己也在那里被一个日本兵击毙。子弹已被取出留在医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知悉我们自己的人，包括初步接受教义者(Catechumens)和同情者，有多少已被杀死，因为许多逃到乡下，家道殷实者则迁居内地。12月16日，当我们正在难民区一个地方举行简陋的宗教聚会时，就被抓走14个男人，其中至少包括两个男孩，而有一个就是牧师的儿子，有个孩子只有16岁（中国虚岁，实际是14岁或15岁）。这群人

在江边被机关枪扫射致死,只有一个人奇迹般地逃出来。他与其他人一起倒下,虽未受伤但却装死,并以附近尸体掩护自己。他趁黑暗逃走,回来报告已发生的事情。稍后我看到数百尸体堆积在江边。另一个宗教集会的参加者自愿去找一点燃料,在不远的街上被抢劫。他的父亲是一个查经班的成员,这个班在日军进城后由一个牧师主持已数周。全班站立着,董先生(牧师——引者)翻开《圣经》,向他(日兵——引者)说明他们正在读什么。这个日本兵拿起手边一根长而重的铜烟袋,猛击董先生头部。及至我赶到时,发现董先生满面流血躺在地上,连忙把他送往医院。还有一次,我来到一个房屋,那里有11个人被杀死了,除了3个男人外,其余都是妇女与儿童,其中一人是76岁老翁。只有一个5岁(中国虚岁)儿童幸免。还有一个9岁被刺刀刺伤背部和侧身,总算救活了。上述儿童的母亲被强奸,阴户仍插着瓶子。这位妇女的两个女儿,分别为14岁与16岁,被绑着强奸数次,然后杀死。大女儿的阴户仍插有木棍,其悲惨一如母亲的遭遇。在她们被杀以前,分别为76岁与74岁的祖父母,曾试图保护她们,当即被击毙。如果这个严重的悲剧仅仅是个别事例,也许可以说是士兵恣意所为,但毕竟发生这么多如此恐怖的暴行,仅我个人所亲眼看见的就是这样残酷的惨剧。我还曾送一个15岁小姑娘到医院,她告诉我事情发生的经过。她的哥哥、嫂嫂、姐姐和父母,全都当着她的面被刺刀捅死;然后她被带到一个军营,那里有200—300士兵。她被关在一间房里,脱光衣服加以强奸,每日数次,如此将近一个半月,直至她得病,不敢再接触她。她告诉我,那时还关着许多和她同样的女孩。我曾与一个76岁妇女谈话,她被强奸两次,她那寡居的女儿被强奸18或19次,现在不知死活。这是我获知的年龄最大的一个案例。但一位查经班妇女告诉我:她与一个81岁老太太同住,(日本兵)命令老太太脱光衣服,她帮助这位过于年迈的老太太,但老太太终于被枪杀了。我曾把住在德福教堂的妇女,一车又一车送往医院,她们是在被强奸后就医,其中最小一个女孩只有10岁或11岁。我与住堂牧师尔斯特先生花费许多时间守护两座房屋,这里住着我们的老百姓。在形势最严峻的时期,白天我们轮流站在街上,以便观察好几所房屋,而当日日本兵企图进入某



处房屋时,我们就可以及时赶去。元旦那天似乎略微平静,我们俩人便离开一会儿,应邀参加一个宴会。宴会刚刚结束,便有两个人跑来报告。日本兵正在追赶那里的女孩。我们赶紧开车回去,但已有两个女孩被奸污。另一个女孩设法逃走,但一位年长妇女曾为这个女孩跪求饶免,却被刺刀捅向头顶。我还可以花费更多篇幅告诉您此类事例,但我认为我所写的已足以使你知道暴行故事绝非夸张……

我之所以要写此信,是由于坚信应让所有日本朋友了解事实真相。这是给日本友人的一份真诚友谊,让他们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深信,如果日本多数民众知道在这宽阔的国土上发生的事情真相,他们一定会为之震惊,正如我们亲眼看见暴行开始发生时一样。这些暴行事实可以用来对付军方,他们才是冲突的真正根源。

我希望你站在正义与真理的立场,更正你曾无知地提供报纸的任何错误信息……

贝德士是一位善良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又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知名历史学家,所以他特别强调要“真诚地面对事实”和“让事实说话”。他曾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御用喉舌《新申报》之流的伪善谎言,提供大量调查资料与新闻稿。即从上述信件已可看出,他是“南京大屠杀虚构论”最早的积极批判者之一。他在1938年11月29日给友人的信中深刻地指出:“某个朋友采取一种立场,于是就抹煞或摭取若干事实为其立场辩护,这就使他们都流于虚幻。”

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大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和睦共处,不少人也承认宗教自由化的现实,提倡教内各宗派乃至各个宗教之间的沟通与和解。就贝德士本人而言,他在中、日之间无所偏袒。他爱中国人民,也爱日本人民。他是在华美国学者、传教士当中屈指可数的日本通之一。他曾先后七

次访问日本,对日本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状况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并且以向外界(特别是中国)介绍日本作为自己的志愿。但亲眼看见日军侵占南京后的残暴罪行,使贝德士很难将自己心中过去的“日本相”与现在南京的“日本相”重合起来。在上述致马丁牧师的末尾,他深感困惑的说:“我曾多次访问日本,并有幸全家住在摩耶与令姐为邻。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认为人民可亲。怎样调和我曾见过的日本与我在此间所见的野蛮,这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即令如此,他也没有失去对日本人民的关切与信心,正如他在另一封信所表明的那样:“对日本朋友,对日本民族生活和文化中的优秀品质,我仍旧衷心地欣赏,对他们当中有人遭受苦难和死亡,我也很关注,我希望他们子女前途美好。我始终是个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严酷的经验使我确信,拯救人类不能靠枪炮,也不能靠各民族所崇拜的偶像,只能靠对人类大家庭全体成员的真正关心。”

贝德士同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一样,他们之所以要逐日逐事地翔实记载并向外界揭露日军暴行,既非为美国政府或中国政府宣传,更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名誉地位。他们主要是出于内在道义责任感的驱动:首先是觉得作为知悉内情的极少数人理应勇敢地同全世界说明真相;其次是企望通过揭露赢得广泛国际同情,迫使日军对暴虐罪行有所约束。《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第一、二两章连续引用的那两封长信的笔者,南京安全区主任费吴生在此信一开头也曾表明类似心态:“我要叙述的不是一个愉快的故事,而是很不愉快的令人不忍读的故事。这个故事有难以想像的太多罪恶与恐怖,这是一伙具有无可比拟的兽性的下流盗匪残害他人的故事,他们将这一切暴行放肆地施之于和平、亲善而守法的人民。即令这个故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我觉得也必须讲出来。只有讲出

---

Bates' Papers, RG10, B4, F52.  
转引自《Bates of Nanking》, p. 5.

来,我才能安宁;是不幸还是有幸,我就是极少数人之一,我们有责任讲出这个故事。”这也许可以看作是贝德士等人的共识。

也正是由于如此,国际委员会记录日军暴行的文字资料,具有非常客观、公正的特点。特别是那些通过各种方式和秘密送出的私人信件,更是坦诚、翔实而令人信服。本人所引用的仅为这些信件之极少部分,我尽量不作删节或少作删节以保持原貌,就是为了读者直接接触当时当地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便于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但是,也不能不指出,由于战乱环境的限制,加以贝德士、史迈士等资深学者特别强调调查核求证,他们对日军非战争行为造成伤亡数字的估计偏于保守。

以贝德士为例,他在日军占领南京半近一个月的时候,即1938年1月10日发出的密信,即认为有“一万多手无寸铁的民众被残酷的杀害”。1938年11月29日的另一封信更明确地指出:“我们对南京平民被杀数字的最后统计是12000人,十分之九与军事行动无关,其中包括许多女人、儿童与老人。”所谓最后统计,就是国际委员会委托史迈士主持的南京地区战争损失调查的结果。贝德士与史迈士颇有点学院派气味,尽管这一调查从客观环境到调查方法都有很多局限,但直到1946年7月出席东京国际法庭作证,贝德士在陈述词中仍然重申:“据金陵大学教授斯密士(即史迈士——引者)调查,有一万二千非战斗人员被杀。”这个数字与通常所认为的南京至少有30万人被杀相距甚大,人们有理由对此提出质疑。我的看法如下:

第一,贝德士从来没有把12000人作为南京地区被日军杀害的非武装中国人总数,而只是作为安全区及其周围经调查核实的平民被杀数字,因此决不可以把12000人看作是南京大屠杀中国

---

GR 11, B9, F202, 原信收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Bates' Papers, RG10, B4, F52。

Bates' Papers, RG10, B4, F52。并参见《南京战祸写真》的有关数字统计,贝德士实际上也参与了此类调查的策划与组织工作。

## 民众死亡总数。

第二,作为严谨的历史学者,贝德士陈述事实一丝不苟。他在谈及 12000 这一数字时,一般也要客观地介绍其他人士不同估算,以供外界比较分析。前述 1 月 10 日函在说到“一万多手无寸铁的民众被残酷地杀害”时,紧接着便指出:“大多数我所信赖的朋友认为远远不止此数。”过了两个多月,贝德士在给马金牧师的信上又提供了新的信息,即中国慈善团体“从 1 月 23 日他们开始工作到 3 月 19 日,已掩埋了尸体 32104 具,他们估计尚待掩埋的尸体数字与此相近”。据此即可推算,仅中国慈善团体已经和尚待掩埋的尸体已达 64000 具以上,这还不包括“其他一些团体也在从事掩埋工作”。此外尚有“当地老百姓自行掩埋的”,仅守墓人所知一例即达两三千人。而贝德士在同年 11 月 29 日一封信中又提到:“三万以上,已抛弃武器的军事俘虏被残害,大多是捆绑成行在江边被机枪扫射而死。”

第三,我还发现贝德士在 1938 年二三月间所撰一篇驳斥日本宣传的评论稿,内称:“自从日本人无缘无故地发动侵略以来,已经过去了 7 个月了。他们军队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彻底破坏和一派混乱的迹象。为蓄意制造恐怖,日本军队对平民百姓进行残酷无情的屠杀和空中轰炸,而由于严密的新闻封锁,那些更为令人发指的行径永远也不会为世人知晓。最有可靠根据的事实是,在日本军队前进时,在上海—南京地区至少有 300000 平民已被杀害。”这是迄今为止,我在《贝德士文献》中查到的他所提供的最高数字。尽管是包括京、沪两地,但由于大规模滥杀平民确实主要是在南京地区进行,而且还未包括上述“经允许予以保护而自动放下武器的士兵”之大批受害者,所以这个数字对于自认为“保守”的贝德士而言,已经是够大的了。

---

Bates' Papers, RG10, B4, F52.

Bates' Papers, RG10, B103, F876.

贝德士做为重要证人,曾先后出席东京、南京两次军事法庭对日本侵华主要战犯的审判。他在接触更为广泛的相关资讯以后,再次明确指出:“检查安全区报告及红十字会埋葬死尸之报告,男女小孩死数甚不完全,且较实数为少,盖平民死亡决不止12000人,无武器之军人被杀者亦决不止35000人。以上所述为确知之情形,其不知者,定较此数为大,亦无法计算矣。”这可以看作是贝德士对南京大屠杀死亡总数最后一次正式表态。当然贝德士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能够对此总数作出权威的判断,因为根据他在战争期间的丰富实践经验,深知在如此大规模的而极端野蛮的侵略战争中,统计伤亡总数,很难做到十分精确。1941年6月25日,他在纽约为国外布道会议所作的一次内部演讲中,在谈到中国人伤亡总数时,曾指出日本公布的数字比实际数字至少缩小三分之一,而“在这场战争中,一百万伤亡可能从来没有记载”。贝德士认为自己的责任,仅止于就自己亲眼目睹和经查证落实的调查,向世界说明南京所发生的真实故事。贝德士等外籍人士,主要是做难民救济工作,他们所做的已经够多,我们不必对他们作过高的苛求。

贝德士一贯保持承认自己有所不足的谦虚美德与求实学风,他与浮夸宣传无缘,更厌恶哗众取宠,而这正是《贝德士文献》史料价值之所在。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所)

(责任编辑: 刘兵)

---

贝德士陈述词,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1页。

Bates' Papers, RG10, B98, F800.